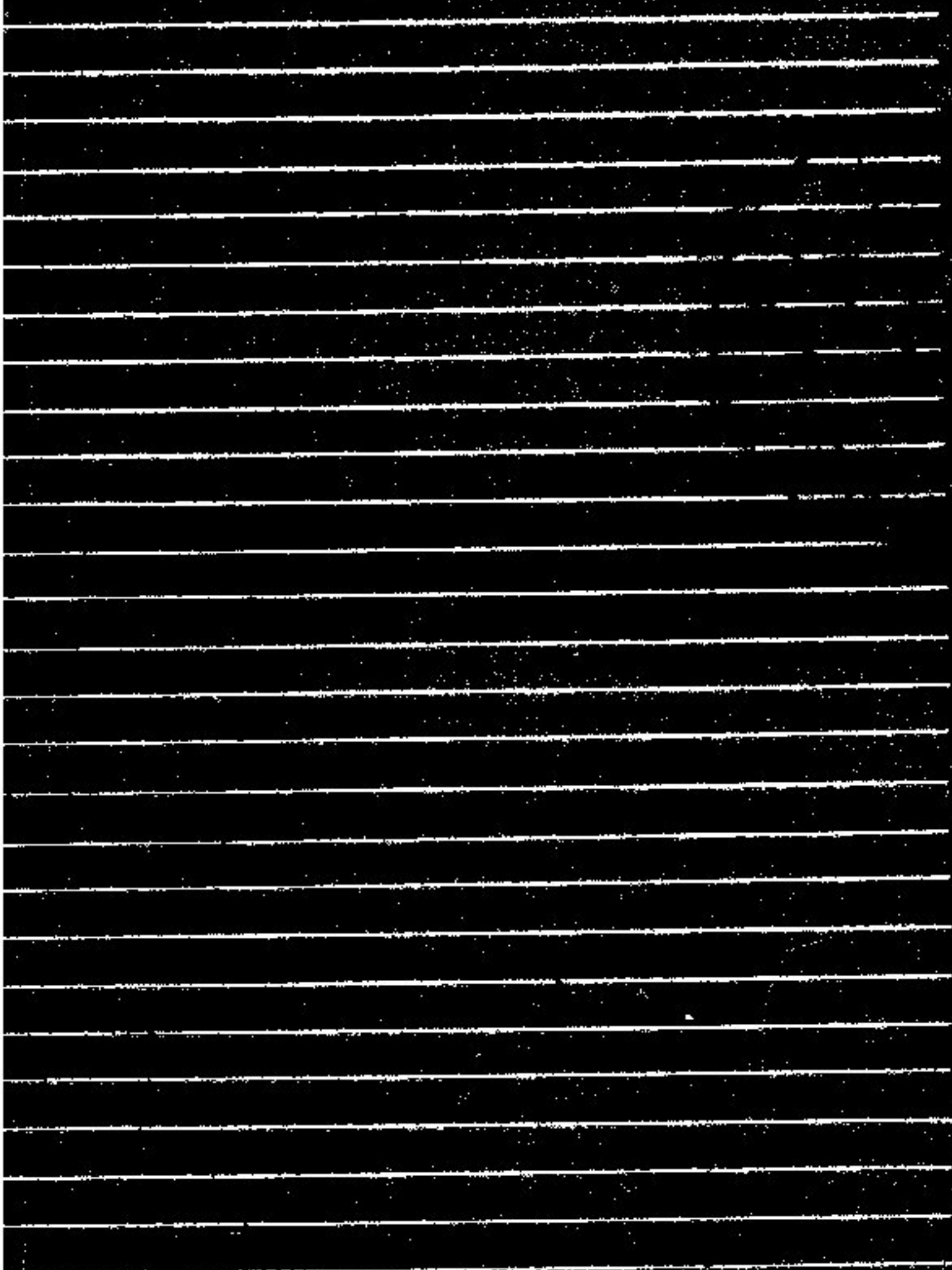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编

责任编辑 李定铨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九)

编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
(上海绍兴路5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90年3月

ISSN 1000—6109

国内统一刊号 CN81—1229

定价 3.15 元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盛丕华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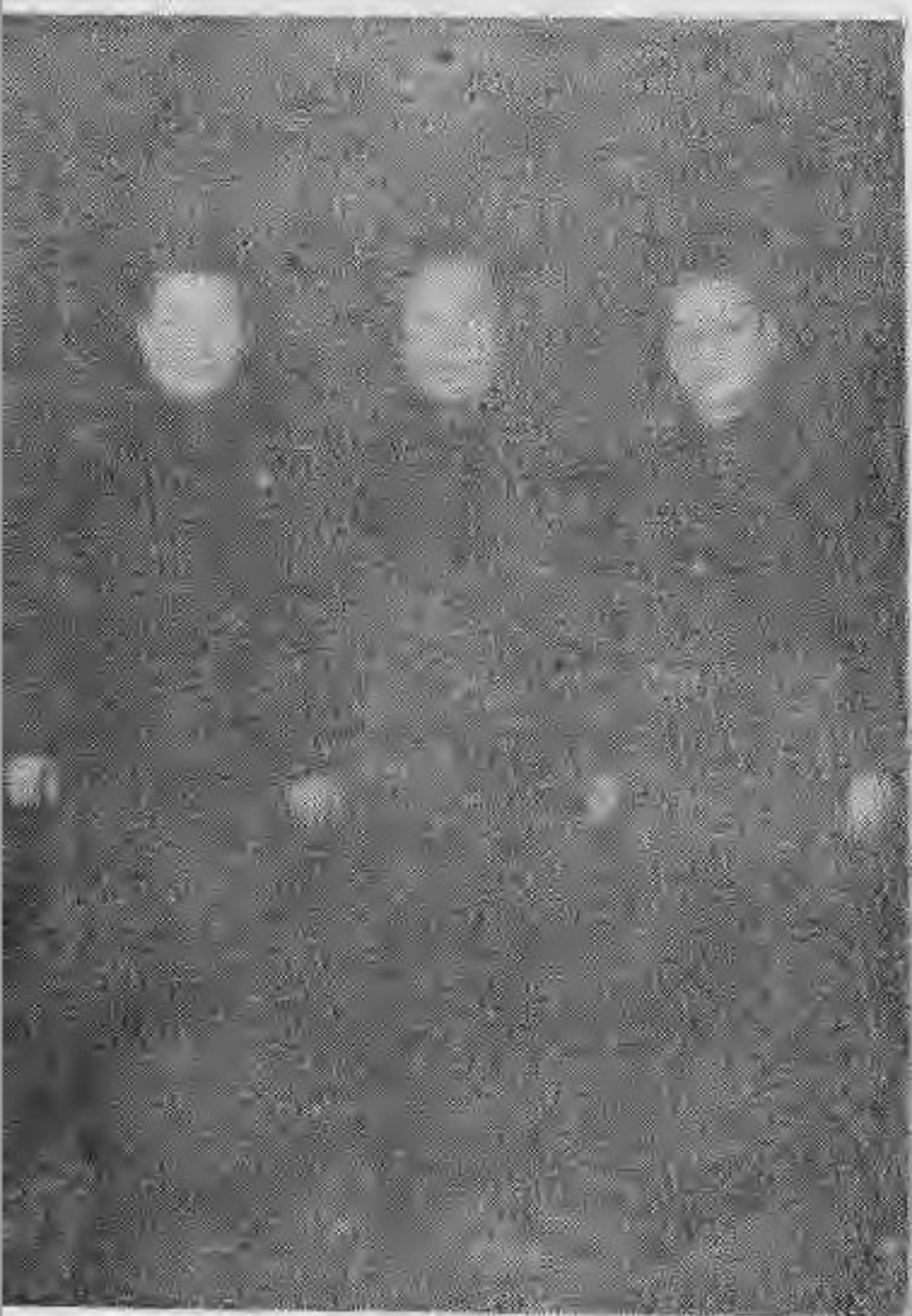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春节期间，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会见周谷城、刘靖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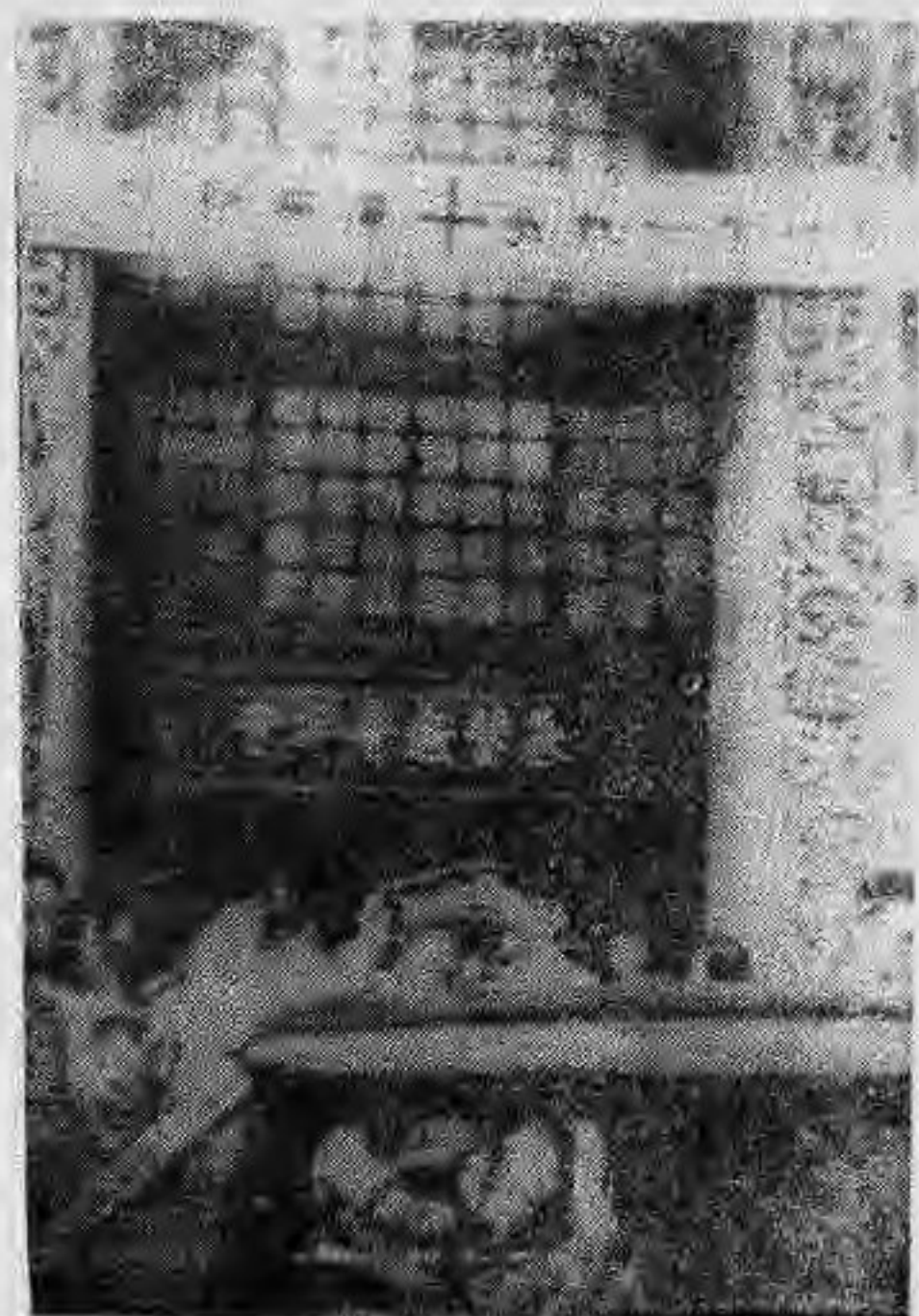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会见刘靖基等工商界人士



一九五〇年十月在上海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陈毅（中）、潘汉年（右）、盛丕华（左）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副市长时的合影



周谷城先生依韵和湖南师范大学何泽翰教授的赠诗手笔，录供上海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解放前举办上海学生救济会活动时的留影

目 录

我所感受的团结〔续篇〕	周谷城(1)
我的道路〔续〕	吴若安(6)
我在解放初期感受的统战工作	经叔平(19)
回忆陈毅同志	周而复(23)
(一) 定心丸的威力	
(二) 知识分子的春天	
怀念潘汉年同志	荣毅仁(41)
追念许涤新同志	刘靖基(46)
上海解放前夕到建国初期的胡厥文	陆象贤 卢 鸣(49)
盛丕华、盛康年父子的进步活动	盛吉甫(59)
提倡国货事业的王性尧	李文杰(69)
严谔声先生二三事	唐慧敏(76)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民主工商界的双周聚餐会	李正文(81)
商报编印《转换中的北平》问世前后	唐季平(86)
在上海商报馆印制《约法八章》的情况	史正鉴(99)
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成立经过	梅达君(101)
解放前上海私立中小学校长互助会活动追记	戚逸影(104)

丁贵堂在上海立功	李正文(114)
营救丁贵堂离沪赴渝	朱德君(120)
我的太原之行	彭健华(129)
国民党 111 师起义始末	曹成镒(140)
记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	张 炎(160)
回忆上海学生礼拜堂	上海学生礼拜堂史料编写组(176)
沙彦楷先生传记	陈先贻等(191)
先父伍特公小传	沙新六(195)
我和上海少数民族工作	金幼云(199)

我所感受的团结〔续篇〕*

周 谷 城

农工民主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刚刚闭幕，你们下午就来看我，征集统一战线工作史料，很好。我在上海曾担任过市政协副主席，兼任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征集史料工作觉得很有意义，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也有责任为你们提供有关的史料。长文不能写，写点短文还可以，或者写几句诗，供你们参考，你们看如何呢？我想到了一首诗，是1988年夏我九十岁的时候，湖南师范大学何泽翰教授赠给我的一首七律，我依韵和了他的一首诗，作为九十抒怀之作。这是我书写的手笔，拿来给你们看看，如果要得，就录供上海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注：谷老书写的九十抒怀一诗的原文刊登在本辑的图片上）

我这个人喜欢和朋友谈天。过去和毛主席经常谈的两句话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主席说，他也是讲一张一弛的。《礼记》上说：“张而不弛，文武勿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勿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一个人如果老是紧张下去，那当然吃不消，但也

* 1982年周谷城同志曾撰写《我所感受的团结》一文，在《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一辑上发表。1988年11月14日征集组的同志在北京拜访谷老，请再提供有关史料，谷老慨然应允，侃侃而谈。现根据录音整理发表作为前文的续篇。——编者

不能过于松弛，如果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做懒汉做到底，那便完全没有生气。做工作，作学问，都要有规律，要劳逸结合，并持之以恒，才能真正做出成果，而又心情舒畅。这个道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中国如此，外国如此，全世界统统都是如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样是可以长寿的。我经常讲这个道理，讲得人家鼓掌。

同朋友谈天，要谈得有兴趣，想法子调动对方的积极性，使对方感到有所得而不至于乏味，否则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我也有个缺点，每次谈话都因为兴趣好，而把时间拉得很长。我给你们讲几个故事。

1988年3、4月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香港记者问我，你岁数这么大，还未退休，工作吃得消吗？我立即用三句话答复：第一，共产党的领导英明，希望各民主党派的人多做一点工作，我也不例外。第二，我还有个单位，名曰农工民主党，人们看得起我，使我成了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因此我可以出面任事。第三，我这个人不知老之将至。根据科学家研究，据说一个人可以活到140岁，不过我决不会活到那样久，大家可以放心。话未讲完，会场里的人就大笑起来。后来这位记者回到香港，说我对这个问题回答得好，有针对性。

解放初期，英国有一个叫什么劳动党的代表团，几十个人来我国访问。到了上海，陈毅市长设宴招待他们，同时邀请我国一些人士参加，把我和陈望道、郭棣活等同几个外国人排在一桌。席间，有个外国人叫菲利普的，向我们问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自由市？陈望道先生回答说，有三个，一是北京，一是天津，一是上海。菲利普接着说，只有三个，我们英国却有几十个自由市啊。他讲话的语

气,似乎是夸耀他们有那么多自由市,显得看不起我们。此时我插话说:你们有那么多自由市呀,那倒像是中世纪,中世纪欧洲有个汉萨同盟,拥有70几个自由市哩!这话刺中了他,他面孔有点红,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觉察到这一点,赶快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去,做到有礼有节,大家仍然谈笑风生,兴致很好。说话如果使人听了不高兴,不一定是自己的胜利,但也不能让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

还有一回,一位智利记者叫亚历山大的,自称是研究学问的,来上海前曾征求陈毅市长的意见,要找一个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懂得西方历史文化的人交谈。陈毅市长看中了我,要我同他谈谈,还带了两个翻译,一个懂法文,一个懂西班牙文。那次,亚历山大是到我的寓所来谈天的,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亚历山大说,他喜欢同人聊天,相互探讨问题,并想到印度研究佛经。我说,那很好,我有时也研究佛经。接着他又问我:毛泽东思想怎么样?我说:毛泽东思想很好。他不相信,说我说的不是真话,并说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是口头上讲毛泽东思想好,实际上不一定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我说:你不相信,那也没有办法,我是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的。亚历山大又问:你是属于什么党派?我说:我是农工民主党人。他笑着说:你既然相信毛泽东思想,那为什么不进中国共产党?我回答说:我水准不够。他说:你讲的是假话,你是真的反对共产党。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凡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说他不参加共产党是因为水准不够。他的话说得很厉害,有点咄咄逼人。我就反过来问他:你刚才讲,你舅父是个什么党派的成员,你父亲也是一个什么党派的成员,而你对你的舅父和父亲都很好,你办的报纸也是为他们宣传的,可是你对这两个党派都不参

加,那你是赞成他们呢,还是反对他们?这样一问,他觉得理亏了。我是用英语同他讲的,两个翻译都懂英文,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说驳得有理。后来我们越谈越有劲。他自恃知识渊博,满想找一个既懂中国文化,又懂西方文化的人谈天,据说他在北京找人谈过几次,谈得不怎么深。中午,我在家里请他共进午餐,他一个,我和我的夫人,还有两位翻译,用的是中国的吃饭方式,一边吃饭,一边谈天,时间拉得很久。席间,我说毛泽东同志是我的老朋友,在湖南我们就相识了。他说恐怕未必。我说那是真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没有半点假意。但有一点我感到很抱歉,很惭愧。宁汉分裂时,国共两党关系破裂,毛主席带兵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周恩来同志等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可是我怕死,往上海溜,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解放以后,毛主席到上海来,或是我去北京开会,他总是要找我去谈天。有一次,大约是1958年,也就是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的那一年,他来上海,打电话找我到他的住处去。闲谈间,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进来,我不认识他,他向我打招呼,我就站起来同他握手。毛主席看见我站起来了,他也站起对许建国说:这是周谷城先生,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我即刻插话说: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没有跟主席上井冈山,同主席有天渊之别。这时,毛主席连连摆手说:没有人怪你的。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外国记者讲我说的是假话,所以我回答他,我是真的相信毛主席的。

去年,我写了几篇文章,讲的是教学科研,反帝爱国,那是我几十年来教学和工作中的体会。后来我整理了一本回忆录,其中有一篇题为《我所感受的团结》一文,是你们《统战工作史料选辑》里登过的那篇文章。解放前,我在复旦大学教书,1951年还当过复

旦大学的教务长，那时只有 50 多岁，还是个中年人。现在是过了 90 岁的老年人了，但我仍然喜欢看书和哼诗，追求新的知识，觉得对新的事物愈钻研愈有兴趣。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一向讲“尊师重道”和“博大精深”这八个字，并常用这两句话勉励青年后辈。1986 年，我写了一首诗，可以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束。诗曰：“欣逢三十六周年，建设桩桩奏凯旋；内政外交都获胜，精神物质两空前。老安回忆当时事，后起思齐祖辈贤；国庆高歌添一曲，台湾大陆早团圆。”

我这个人喜欢讲话，花了你们不少时间，可能是废话连篇。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可以整理出来，用《与朋友谈天》的题目发表；要是从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的角度考虑，把上下文连结起来，用《我所感受的团结（续篇）》这个题目也好。

（黄松岗整理）

1988 年 11 月 14 日

我的道路〔续〕*

吴 若 安

九、才轻任重

1956年1月，上海私立女中改为市立第十女中，我调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兼市十女中校长。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但从学校到政府机关工作，是生平第一遭，一切都较陌生，在陈琳珊局长和汪亚民、杭苇副局长等的热心帮助和支持下，才逐步适应。

我在市教育局主要分管学校卫生、体育以及盲、聋哑学校的教育工作。那时我虽年近七旬，但体力尚好，常到学校检查卫生体育工作，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看到盲、聋哑学校学生，在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勤奋学习，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如同一般学生一样活泼有生气，感到十分欣慰，和解放前有天壤之别。有一次在集会时碰到陈毅市长，他笑吟吟地问我：“你现在是不是在教育局工作？”我说：“是。”他以风趣的口吻说：“哦，可别当官做老爷啊！”陈毅市长的话意味深长，使我很受教育，从此更注意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关心学校师生员工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曾先后获得人民政府颁发的“爱国卫生”和“体育工作”两枚奖章。

* 本文第一至八节载本专辑第8辑。

当时我是民进上海市委员会的负责人，民进会员大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如何把民主党派工作与我在教育局的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民进会员在学校中的作用，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了摸索经验，我带领民进市委机关干部，到杨浦区市东中学，调查学校教学和该校民进支部的工作情况，进一步推动了民进会员在学校中发挥作用。学校领导反映，民进成员大多工作表现较好，业务水平较高，是办好学校的骨干，有的还是先进工作者。通过这次调查，使我初步领会到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探索到如何把自己的岗位工作与民主党派工作相结合的一些经验。

十、民进献力

我是1951年6月，经谢仁冰同志和我外甥女陈国容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当时上海民进组织的名称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分会，主任理事是谢仁冰同志（章汉夫同志的父亲），他为人谦和，办事干练，深为会员们所敬重。我参加民进后，即被推选为上海分会的理事。1953年，谢仁冰同志因病逝世，由赵朴初同志继任分会主任理事，我被推选为副主任理事。1956年，赵朴初同志调北京工作，民进上海分会改名为民进上海市委员会，我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曹鸿翥、周煦良、段力佩和黄丹麓等同志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曹鸿翥兼任秘书长。

1980年1月13日至16日，民进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展览馆举行，来自教育、文化出版、医卫界和机关、企业的会员代表共259人。我在会上代表民进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作了题为《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建国以来

民进在贯彻执行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在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1984年4月间，民进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文艺会堂举行，出席和列席代表共325人。会上，李楚材同志代表民进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作了题为《团结起来，加快步伐，勇于创新，为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杨堤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统战工作的任务愈加繁重，我愈加感到年迈体弱，力不从心，早有引退让贤之意。1988年5月，民进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联谊俱乐部召开。大会宣读了我请求辞去民进主任委员的信，得到代表们的支持，和我同时要求引退的还有副主委陈云涛、李楚材、董绛尘、张乃璇等。大会宣读了给我们引退同志的“致敬信”，对我过去的工作给予表扬，并聘为市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使我深感不安。但虽百岁高龄，仍将一本初衷，继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献力。

十一、幸福会见

解放以后，我曾有幸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

1957年，刘少奇同志（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上海访问，曾会见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教育工作者。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询问上海中小学教育的情况。我作了概要的回答，他听了点头微笑

表示满意。他那慈祥的笑容、淳朴的仪态，以及深入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我以很大的启迪和教育。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一次老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多是白发苍苍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民代表，我那时年近70，应邀参加座谈。周总理当时60岁，他神采奕奕，浓浓的眉毛，闪亮的眼睛，魁梧的身躯，和蔼的面容，使人感到十分可亲可敬。他风趣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刚刚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的。”顿时全场欢腾，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老人们对总理的热爱。他勉励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30年过去了，这句话至今仍然萦绕在我的脑际，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到中国大陆，周总理亲自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我和上海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赵祖康、周谷城等一道到机场迎接。在候机室，总理看到我，便亲切地问道：“吴大姐，你多大年纪了？”我说76岁了。总理笑着说：“你年纪这么大，怎么头发还没有白啊！”他这句诙谐的话，立时引起周围人士的笑声，使候机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文艺教育界部分人士约30余人，我应邀躬逢其盛。新中国建立后，我曾多次见过毛主席，但都距离较远。这次会见距离很近，看到毛主席身体强健，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慈祥和蔼，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和幸福。毛主席亲切地同大家谈话，同周谷城同志谈百家争鸣和历史学问题，同谈家桢教授谈遗传学问题，同文艺界人士白杨、上官云珠、徐玉兰等谈百花齐放问题。谈话间，毛主席取出香烟，风趣地向大家征询意见：“我能不能